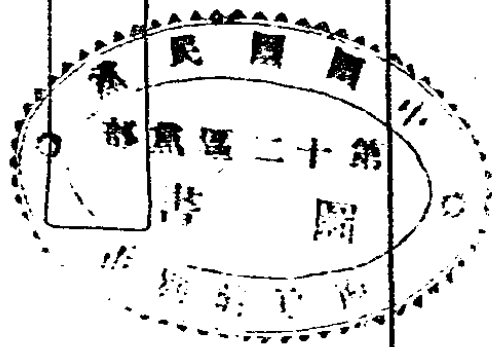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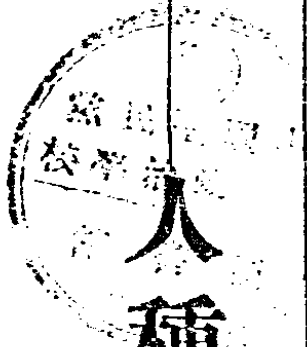


馬克斯主義的

人種由來說

恩克斯遺稿
哥來佛長序
陸一遠譯



馬克斯主義的

人種由來說



哥來佛長序
陸一遠譯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十七，十一，十〇，付排。

十七，十一，三十，初版。

1—二〇〇〇册

每册實價四角

上海高塔路四達里春潮書局發行

目次

目次

達爾文主義與 <u>馬克斯主義</u>	一——五八
一、 <u>恩格斯</u> 是 <u>達爾文主義者</u>	一——七
二、 <u>達爾文主義</u> 的真諦.....	八——一〇
三、自然的技術.....	一〇——一三
四、人是社會的動物.....	一三——一八
五、兩個發展的形式.....	一八——二五
六、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	二五——三五
七、勞動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	三五——四六
八、從 <u>達爾文主義</u> 到 <u>馬克斯主義</u>	四六——五一

九、勞働是有機體進化的要素·····	五二——五六
十、結論·····	五七——五八
勞働是猿到人類的進化過程中的產物·····	五九——八一
人類進化的過程·····	八一——八四

第一卷

序言——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

哥來佛著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

(一) 恩格斯是達爾文主義者

我們數千萬年以前和猿類相似的祖先怎樣變成爲人類的這一個問題，對於我們宇宙觀的確定有莫大的意義。它是一個最有意義的問題；達爾文對於我們的祖先，曾有過簡略的紀述。恩格斯是馬克斯的摯友和同事，一般學者中，只有他最能了解這問題的意義，當他解決這問題的時候，比任何學者都要深刻獨到。這偉大的社會學家和思想家，在他有名的傑作（原稿散失，惜非完璧）中，用很具體的很簡要的例子，對我們說明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密切關係。



(備)

恩格斯不是自然科學專家，他不曾以自然科學做過他的職業。但他對於一般的自然科學問題，特別是生物學問題，發生過很大的興味，加過深刻的研究。因之恩格斯對於達爾文主義的關係，比不得一般好奇家的關係，恩氏所有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意義至為重大。當然，恩格斯是達爾文之熱心的忠實的擁護者，但他對於達爾文的思想，不會同教條一樣地看待。當恩格斯研究猿類動物之若何進化爲人類，以及人類之所以成爲人類的問題時，他發表過他有價值的意見，而又確定過主要的原則。他在達爾文主義中，輸入達爾文本人所未會注意的要素。達爾文本人對這要素雖會注意過，但沒有過十分真確的估量。

從恩格斯的著作看來，馬克斯主義是補充達爾文主義的學理，這就是說，只有馬克斯主義的達爾文主義者，才能把猿類動物變爲人類的經過情形，

描寫得真確。若是自然科學家，對於人種由來問題，發生糾紛的意見，那就因為這般達爾文主義的學者，至少是大部份，不會站在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說話的緣故，所以，他們決不會注意到勞働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

誰都知道，達爾文的第一部著作——『物種由來』——是在一八五九年發行的，這正是一個科學的宇宙觀的創始時代。是年初，馬克斯有名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評』——發表了，在這著作中，確定了唯物史觀之基本的原理。真的，從年代看來，馬克斯與恩格斯確定自己的學理、比較達爾文公佈他的學理的原則還早；可是著作出版期之吻合，正所以證明這兩個偉大的學說，有深刻的相互關係，它們在我們的宇宙觀中，引起了莫大的變化。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共同點，在於：一切有機物界和人類社會生活所有的一切現象，都是可以用科學的自然的原則來確定的，在神學與形而

上學的眼光看來，它們就會把物質條件做基礎的一切現象，認為是神秘心靈的產物了。達爾文，對於聖經創造萬物的學理，不論從前所謂『科學』——神學，形而上學之若何推解闡發，終無以解他的疑惑；不久，他在『物質條件』的基礎上，求得了萬物由來的真正的解釋。同樣，馬克斯與恩格斯，深致疑於唯心（黑格兒的）哲學之對於法權的解釋以及過去對於歷史的認識。當時，他們研究所得的結論，便成爲將來研究各問題的關鍵，謂：法權關係，和國家的形式一樣，是不能從它的本身和人類靈魂演進的過程中去認識的，法權關係的基礎是建築在人類生活的物質條件上面的……所以，解剖社會，必須要從政治經濟學着手（參閱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評的序言）

這二人的學理，純粹是以科學的物質的條件，作他們的出發點的。馬克斯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或『史的唯物觀』，便是他的科學

思想的結晶體。馬克斯和達爾文在自然科學中，築下了他們的革命學理之堅實的基礎，他們將一切人類的『意識』和『行爲』，重新加以徹底的估量。

恩格斯在達爾文的傑作出版的前一年，已將達爾文主義的原則，說了個大概，這是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自然科學已有了進步，恩格斯依據已有的許多科學定律，得着了這樣的一個結論，說一切現象，往往是互相轉換的；所以，一切的自然，是整個的，同時又是在不斷的演進的。達爾文主義的根本思想，也就在這意義上。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在他答馬克斯的書札中，曾經簡略地說明過他的這個意見。他研究生物學時，得了不少的心得，他就在信上寫着說：『我現在研究的是生理學，附帶研究的是比較解剖學。在這數種科學中，頗

有幾種新近推論所得的學理。我的喜歡研究這一類的科學，不知道年老人黑格兒也會聽過這一類的學理沒有？這是毫無疑義的，若是現在由黑格兒來著述一冊自然哲學書，那必然有很多的事實羅致在他的左右……生理學之革新，以及比較生理學之成立，最大的原因，就在細胞的發現……一切都是由細胞構成的。細胞即是黑格兒所謂『行動的本體』。當『思想』——完成的有機體——尚未從細胞中發展出來的時候，那細胞的演進，確是按着黑格兒的（辯證法的）過程發展的……研究比較生理學，你就會蔑視人爲萬物之靈唯心的思想。不論在什麼地方，人類的構造和哺乳動物的構造，是完全相吻合的，即在一切的脊椎動物和昆蟲等類，也有與人類相吻合的地方。（參閱『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函件往還集』）

這樣，恩格斯根據生物學研究之所得，對於自然的一致與自然進化的意

義，詳為闡明，不遺餘力。綜之，恩格斯對於達爾文主義的觀察，及其對於人種由來問題的推解，確有重大的科學的意義。

(二) 達爾文主義的真諦

達爾文主義所欲研究的是什麼呢？

在達爾文以前人皆以為有機物界是固定的，亘古不變的；動植物和人類的模型，生成是如此的。換句話說，他們是以神學的眼光，觀察萬物的，所有一切的事物，認為不變不易的東西，相互間是沒有聯繫的。試看恩格斯的意見，我們就知道：『達爾文對於神學的自然觀，曾給以重大的打擊，達爾文證明說，現代的有機物界，不論它是動物的，植物的，或是人類的，皆是數千萬年進化過程的產物』（參閱恩格斯：『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

會主義

恩格斯對於達爾文學說的根本觀念，曾用一種很簡單的，而又明瞭真確的說話來說明的：

「達爾文從他的科學方法探究的結果，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說，動植物的形式與構造，非固定的，而是變異的，他在研究室中要向前推究這一個結論，他除了人工方法來研究動植物以外，再沒有較好的方法了。英國在這關係上，是一個模範的國家。在其他各國，例如德國人工研究工夫，不及英國範圍之廣且大；英國人工研究方法的造詣，在前一世紀已大有成效，所以，要確定各項的證據，自無多大的困難。根據達爾文的考察，那由人工所培養的同種的動植物，其差別之大，甚於一般人所習見的天然的同種的動植物。這樣，一方面，物種的變異已有相當的證實；另一方面，形式不同的有

機體，未必沒有共同祖先的存在。此後，達爾文所欲研究的，是：用人工蕃殖法所獲得的有機體的變化，是否在自然的本身中亦能求得同樣的變異的主因。——研究這一個問題。達爾文對於自然的胚胎，與實際成熟的有機體加以比較。每一個胚胎都有向前發育的要求；可是在發育的過程中，不僅有機體與有機體的競爭，還有空間與光度等的競爭。所以在這物競天擇的鬥爭中，只有具有利於生存的特性的個體比較有成熟和蕃殖的希望，這個體的特性，又有遺傳的傾向的，……沒有這一類特性的個體，就不免歸於滅亡。物種之受自然淘汰而後引起的變異，就是由此得來的」（見恩格斯——「

Anti-Dühring J）

這樣看來，生物雖然易於蕃殖；但它所遺下的種子，往往超過成熟的物種，因為所有的種子，不能超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法則，凡是能適

應環境的有機體，它便是競爭的勝利者。有機體之變異，即自然淘汰之結果；同一父母的子女，相異之點仍多，各有各的特性，決無一類似之處。由此，惟有適於生存的特性得遺傳之力而保持至久，一代復一代，遇有新的環境時又有新的特性相接而生，而復又有物種的變異。

這樣，達爾文不僅說明有機體的變異而獲得有機體變異的定則了。達爾文根據有機體的蕃殖性，變異性和遺傳性，用唯物的觀點來解釋生物界的進化的因果。這進化的原動力是在於適應環境這一個理由。簡單說，達爾文主義的根本原則，僅此而已。

(三) 自然的技術

達爾文主義告訴我們說：一切動物和植物的生存，是在它們能否適應自

然和環境爲標準的。這是有機體的適應，換句話說，就是有機體需要器官的變化；凡爲生存條件和自然所需要的條件，它便有隨之變化的必要。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習慣以及一切的品性，都是隨着器官的形體的變化而變化的。因之，要了解生物的進化問題，必先要了解：什麼是器官？器官對於動植物的作用是怎樣的？

馬克斯對於達爾文主義之探究，誠能一語道中深遠的意義，他說：「達爾文對於自然技術的歷史，富於研究的興味，換言之，動植物的器官，在動植物的生活中是具有生產工具的作用的。」（資本論第一卷）

所以動植物的器官，可認之爲天賦的「生產工具」，其作用各有專屬。環境的變化，有產生新的自然的「生產工具」之必要時，即有新的器官產生。據達爾文的意見，變異，淘汰，遺傳，是新的有機生物和新的物種之進化。

的要素。環境變化了，一部份器官，便成廢物，這就是說，器官失了作用以後，它就趨於消滅了。（人類的尾骨和盲腸等是）

從馬克斯的觀點看來，達爾文主義的中心問題，就是自然的「生產工具——有機體的器官之若何變化的問題。換句話說：是在研究自然工具的進化史，或是生物器官的發展史。

自然工具之作用既然如此，那末人造工具的作用，究竟是怎樣的呢？人類社會的進化，能否影響生產工具的變化呢？對於人類生產工具的構造，或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有無研究的必要呢？

馬克斯是這樣地發問的，他要我們對於新的科學的研究，加以深切的注意。

馬克斯不僅發出這問題，他并加以深切的分析，明確的答案。他的答案在

人類社會學的重要方面與達爾文在生物學界的發現，有同樣的價值。這就是說，馬克斯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馬克斯臨葬時，恩格斯之所以以馬克斯的功績與大自然科學家的功績相比者，並不是沒有深意的。恩氏說：「達爾文發現了生物進化的法則，馬克斯發現了人類歷史的法則。」試看：馬克斯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進化，是怎樣研究的。

(四) 人是社會的動物

達爾文告訴我們說，人類不能自誇自己的出身是很高貴的，他不是藉上帝的力量在第六日創造的。人類是比較進步的成熟的動物；他是生物界的一部份，須受生物進化法則的限制的。但是這裏有個問題：下級動物怎樣能進化爲高等動物呢？形同猴類的祖先，怎樣能變化爲現代文明的人類呢？

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論，就答復了這一類問題。恩格斯在這一本小冊子中，也有個相當的答復。

誰都知道，有很多動物，尤其是草食動物和昆蟲類，都是羣居雜處的，有家庭復有部落等等。他們不斷地爲生存而競爭，如覓食，禦敵，傳種等等，無不努力追求生命之延續。但是，我們不能說，社會是各個動物自由結合的產物——以爲動物靠自己的『理智』，知道羣居是有利益的，所以他們就結合起來，共同過社會的生活。事實上，這正是一件相反的事！一切社會的生存，不是以社會各個體的自由意志爲標準的，而是以各個體的一般物質的生活條件爲標準的，有了物質的生活條件，便能把他們整個地結合起來了。社會是爲生存而競爭的工具，又是適應自然和環境的工具。

競爭的條件不同，那適應自然的工具也就不同；結果，各種動物社會的

組織形式和生活情形，亦不能不有所變化了。我們知道，蜂類，螞蟻，猴類，海狸，他們過的是經常的社會的生活——生活關係是互助與分工；這是動物社會之最高的形式。

至於人類，他是不能離羣索居而生存的，孤立生活的人類，向來是不曾有過的。亞里斯多德很正確地說過，人類不是一般的動物而是社會的動物；他是不僅在自然中生活而又在社會中生活的。他的祖先，是同猴類一樣的動物，世世代代，過的是合羣的生活。孤立的人類，沒有社會，又沒有同類的協助，他便成爲孤立無援的動物，決無能力覓取自己的食物，抵抗猛獸的侵襲，綜之，他沒有維持生活的能力了。只是因爲人類具有較好的爭鬥的工具——社會生活，所以他們就能發展到現在的這般地步了。

這樣看來，人類在這一方面，是向着一般生物的階梯上升的，他是動物

的一種，經常在同類的社會中過生活的。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發生了：人類社會怎樣能發展到這般高尚的階段，而與動物界完全隔絕呢？爲什麼其他的社會性動物不能進展到這地步，和有理智的人類一樣呢？

我們在未解決這問題以前，尙須答復下列幾個問題：人類之爲生存而競爭，是否和動物有同樣的方法或有其他的方法？這是不是拿達爾文主義的方法，機械地，簡捷地應用之於人類社會就可以解答？

普通看來，對於最後幾個問題的答復，當然是正面的。但這是外表上的觀察，沒有像馬克斯那樣的去研究，一般學者，想把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學理，應用之於社會科學，這就證明他們沒有把物類競爭深刻地分析過，他們不了解「競爭」是各種社會形式之歷史的產物。所以根據他們

意見，達爾文所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話，就不能解釋任何實際的爭鬥，僅成爲一句空洞無據的說話而已。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直接地把達爾文主義的法則應用之於社會了。我們的責任是在解釋：自然科學的普通法則，怎樣地以特殊的爲人類社會所獨有的形式，在社會中表現出來？誰不了解這的，誰就不會求得人類社會史的法則的了。

恩格斯說：『在我們左右的，不單是自然，而又是人類的社會，它有它的發展的歷史，有它自己的科學。』（見恩格斯：——『Feurbach。』）這就是說，不論人類是動物的後身，人類的發展，在長期的文化過程中，與動物界的進化，完全不同。易言之，人類發展的形式，是與動物發展的形式不同的。所以達爾文與馬克斯是由不同的出發點，着手研究的。Sennkovsky說：『達爾文的生物學，研究的：是動物界中的人類；馬克斯的社會學，是

進一步地，研究歷史的人類，與動物完全不同的人類。」（見 *СЕНКОВИЧ*）
「什麼是馬克斯主義？」

人類發展的形式與動物的分別究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就把這問題來研究一下吧。

（五）兩個發展的形式

我們知道，能適應自然的動物，才得生存。人類同樣是個動物，他欲離此法則而自立，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人類適應自然的過程，與其他的動物完全不同，這是因為人類有另一種的發展形式的緣故。

若是任何種動物處在新的區域，那他必須適應新的生活條件，用本身的力量來反應自然界不順適的環境。例如熱帶的動物處在比較寒冷的地帶，那末

在他身上，每每會發生厚密的皮毛，披護在他身上，這是在寒帶動物院中所有的熱帶動物的常見的明顯的例子。反之，寒帶動物遷居到了熱帶，它的皮毛，也每會逐漸地減少。但人類是沒有以身體適應各種生活條件的特點的。人類和其他動物比較起來，他雖具有適應那參差不齊的生活條件的特性，但他不是用自己的身體來戰勝自然，而完全是以另一種的「工具」來制服地面的一切的，他沒有自然的工具，但他却能運用人造的工具。

例如，人類禦寒，不和熊類一樣，是以體毛來披護的，他把死獸的皮毛，湊縫起來，用作護身之具；人類游泳時，不和鵝類一樣，是以跋膜掉水的，他造船作槳，藉代跋膜之用。這是很明顯的：如果說動物是為自然所制服而後適應自然的話，那人類是在戰勝自然以後，達到同樣的目的和同樣的結果的。這就是說，他不曾改變本身的自然，天賦的器官，他完全創造了改進

了彼種或此種的人造的器官和工具；這似乎把他自然的器官完全接長了改善了。是的，槽與槳，彷彿和接長的手一樣，已經是人造的器官了。

所以，動物生存的競爭是以有機體來適應自然的；而人類則以特殊的人造的環境來限止自然環境的反應，至少能夠減少它的反應的力量。這新的環境，在人類向前進展一天也就複雜了一天了，我們沒有它，就不能有進一步的動作，它似乎成了我們的次要的自然了。如果，一旦有了『不可思議』的變化，把人造的環境完全消滅了，那人類必然立刻要回復到原始的，半野蠻的狀態。

這樣說來，人類之適應自然，不是消極的生理的，又不是和一切動物一樣盲目的，而是積極的，技術的，理智的，這就是說，是要反應自然，影響自然，甚至於改換自然來滿足他自己各種不同的要求的。再換一種說法：動物

是適應環境的，而人類是以自然適應自身的；他用文化——自然的改善，或對於自然的統治——的助力，謀自己的生存（「文化」一字就拉丁字源講就是「改善」的意思）。所以，文化是因人類需要而適應身外條件和自然環境的結晶體，是人造環境的複雜化的結果，是人類對於自然的統治，是自然受人支配的實際的反映。

試看恩格斯怎樣地說明這個意見：「動物只利用外界的自然，使之適應於環境；人類則以人工的變化，制服自然，任其使用。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就在這裏。」（見後）

人類脫離動物的階段以後，其生存競爭的形式和效果，自與動物不同。我們要解釋人類之所以不為自然之奴隸，而為文明世界之主人翁，不當從人類與動物之相同處着想，而當就其區別點，詳加考察。我們應該進一步地觀

察什麼是人造的環境才是。

總之，生物的進化，其形式有二：除達爾文所研究的生物進化的形式外，尚有另一種的進化的形式即工具演進的形式，其進化的法則與性質，是首由馬克斯發現的。

誠然，對上述種種，也不是沒有可駁辯的地方，事實上人類以外，尚有很多的動物，亦同樣改換其自然，造成特殊的環境；即如鳥的築巢，鼯鼠的掘穴，就是很明顯的例證。此外蜘蛛的織網，海狸的建築，蜂類之造窩，個中設計，也頗為複雜。但綜結看來，此類動物究竟怎樣地反應自然和創造工具呢？這都是靠自然的天賦的『生產工具』——即自然創造的器官的助力而後可能的。他們只能執行一種特殊的動作，蜘蛛不能執行海狸的建築工作，反之，海狸亦不能同蜘蛛一樣地紡織。人類就不然了，他並不是全靠自身的天賦的

器官，而是用人造的勞動工具和生產工具應付環境的。他只須改變人造的工具，不論他是紡織工人，紡紗工人和建築工人，皆得任意選作那一種工作；他不斷地改新工具的形式，性質及其功用，他在實際工作中，對於他的工具不斷地放驗改善，以求收到更大更多的效果。故人類愈是文明化，那他所需人造的勞動工具愈是加增，自然器官的作用愈是減低了。

人類創造工具的目的在那裏呢？我們可以說，這在於把他自身的器官如手足之類，增多了，加強了，改善了。他確定每一種工具，是為每一種特殊的目的，他的四肢五體，各有其作用，使習之於自然。所以，他能完成範圍較大的工作，用力少，效果却很大。工具可認之為人類體外的器官。物理學家 Wiener 有幾句中肯的話：「望遠鏡是放大的眼睛，電話機是放大的耳朵」（見 Wiener 著——「感覺界的擴大」）。鋸是依齒形造成的，鏟與鋤是依掌形

與爪形製造的，斧是縮形的拳頭，樁是直形的手掌，等等。這樣，人類創造工具以後，他不會將天賦的自然的器官，改良，增進，而又複雜化了。

這裏，我們可以斷然說，人類文化的發展，並不是人體本身繼續的進化。人身的構造，最先進的與最落後的野人，沒有多大的區別；只是因為人類由低級進化到現在這般的形狀，大可不必有器官的進化和變化，祇把人造的勞動工具和爭鬥工具變化了，改良了。個人或羣體的強弱優劣，皆在此變化的過程中決定了。

動物是靠着天賦工具或自然器官所給與的食物過生活的，因為動物不能把它的器官，任意的改變。動物欲改變它的器官，須有長期的演變，甚有延續至數千萬年之久的。所以，動物是消極地，盲目地應付各種不同的環境，逐漸改變其器官的構造，使之適於新的條件。至為人類，則以人造的工具，

不斷地增加了得自自然的消費品。所以他是積極地適應自然的環境，以人造工具的力量，改變其生存的條件。

這樣看來，人類的工具，其作用將與動物的器官等。不消說，達爾文學說，所告訴給我們的是有機體之消極的適應自然之法則，而馬克斯的學說是人類的技術的積極的適應自然之法則。這就說明了：動物進化的法則，不能簡單地應用之於人類的社會，人類生存的競爭，與其他動物不同，他不為生活條件所約束，而生活條件，反為人類所牽制了。動物——永久是自然的奴隸，人類將以自然變為經濟，而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翁了。

(六) 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

人類由自然的奴隸一變為自然的主人翁，究竟的原因在那裏呢？人與動

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呢？換一個方法問：人靠什麼能夠覺悟地積極地應付自然，而又有創造文化的特性呢？

人類對於這個問題的考察，早已發端於古代。各民族的宗教在其神話中，描寫人類文化的發端，是上帝賜與的結果。古代猶太人，深信聖經上的神話，謂亞當，夏娃，承聖蛇的意志，摘食「智樹」的果子，就成爲有理智的人類，他們能用手的勞働，獲得一切所必需的物品了。在古代希臘的神話中，說有一種半神 Prometheus 眼看着人類的困苦，油然發生惻隱之心，於是偷取了天上的火賜給人類，并教導人怎樣備製工具，於是說人類文化之開端就從這時候起。

至於哲人學士方面，在有馬克斯學說以前，他們對於原始文化的解釋，實際上與宗教沒有多大的分別。他們認爲人類的理智是一切智識的泉源，而

這理智，就看作神的形而上的實質。他們深信：文化是由思想，和理智造成的；聰敏的猴類能製石爲工具，聰敏的原始人類能發明取火的方法。總之，在他們看來，人是文化的動物，人之所以進化，其因在其有天賦的理智，和神聖的理解的能力。他們推論的方式，大抵是：「思想在萬物之先。」

現在，我們知道，實際上並不是這麼的一回事：科學告訴我們說，思想的特性，是與腦系有關係的；而有腦系的動物，多少都是會思想的。這那裏是一件稀奇的事呢！我們記得，動物在他生存的競爭中，能改造和發展他的器官及其職能；同時，思想，意識，以及一切精神的心理的活動，也無非是人類爲生存而競爭的工具。誰都曉得，猴，貓，狐，虎等之狡猾敏捷，無非是生存競爭的工具，與銳利之爪爪同一意義。這樣，意識既一樣也是競爭之工具，因了自然淘汰而增進；那末，很明顯的，意識之發端，也必是自然的，是受

因果律的限制的，和人類與動物的器官之由來一樣。

我們有很多事實做推論的材料：當人類歷史萌芽的時候，合若干人而成羣的原始人類，對於外界事物已有相當的認識。當時人類所有種種對於自然的認識，皆由動物狀態遺傳所得，正與其他動物之巢穴以居，同一性質。

但是高等動物的理智爲什麼仍滯留在人類歷史萌芽時的狀態，沒有長進；而人類的理智竟能進化到現在的地步呢？原因在於質的區別而不在量。換句話說，人與一般生物之間，不是以器官發展的程度而是以實質的高下爲區別的標準的。主要的原因在於只有人類是勞動工具的生產者。人類有製造工具的能力，即在開始利用石器的時期，已超越於一切動物了。人類有此特性，所以一切生存的競爭可以不必專恃天賦工具的器官。例如：在從前人類無力捕捉飛禽，而人禽各自爲生，漠不相關。自工具日漸改進以後，雖如

投石之簡單，而人之於禽，已有控制的能力。從這時，於人之禽起候，已為生存條件之一了。

原始人類，自己不會生產過食物，他是用力採集或是攫取的，所以這些食物，只是自然的產物。人類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能不時刻與自然界的各種敵人作爭鬥。他若永遠不是一個生產者，那與他競爭的敵人，將歷萬世而不滅。只要他能製造工具，那就有技術產生了。有了原始的技術，人類即能禦猛獸，覓食物，用力少而其效果已經比較以前加大。在啓蒙時期，工具與武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人類藉此可以離叢林而索居，不必有賴於樹蔭之庇護，就在「不毛之地」，亦不至有食料斷絕的憂患。所以人類自有技術工具的製造以後，生活的水平線，已經積極增高了。再有火食的發明，文化更因之而猛進了。

這樣看來，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能擴大生活的範圍，在於有生產與爭鬥的工具。人在自然的舞台上，與新的原素——人類的技術俱生。動物有自由移動的能力，較勝植物一籌；植物須在蒔種地域獲得其養料，動物除少數低等種類外，能自由覓取食料，能自水土不宜之地帶移至氣時適宜的區域。但是動物不能加增各種食料的數量，具有這種能力的只有人類，人類中從來沒有不知道利用工具作為生存的幫助的，人之所以超於動物，而動物之超於植物者，就在這種地方。（見考茨基：自然與社會之蕃殖和發展）

固然，有幾種高等動物，也是能靠工具覓食和與敵爭鬥的。例如：猴類如果我們教以怎樣持叉，托碗，穿衣，等動作，也能照樣倣效。有時，猴類也知道用葉披身，夜間及雨時，就拿牠當作人類的屋頂。有時，更能取石塊樹枝向敵人拋擲；有時還知道用石塊擊破胡桃或木片，幫助齒力所不及。有

人說象以長鼻捲取樹枝，作為驅蚊之用。但是總結起來看：這種動物所使用的，都是由自然中得來的現成的工具，不曾加以改製過的。他們不能以人工的方法製造工具，又不能以人工的力量加強自身的器官——手，足，齒，鬚，等等。所以在這類動物的生活中，工具的作用，遠不及野蠻人類的生活萬分之一。

人是製造勞動工具的唯一動物，可以稱作『人匠』，或者簡單點可稱之『創造者』。馬克斯認佛蘭克林 Franklin 的定義，『人是製造勞動工具的動物』為唯一真確的定義，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動物界與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沿着同一方向發展的。

人類自能製備簡單的工具以後，他就進到了人類發展史之新的階段：人的動物階段，從此告終；人的歷史，就此開端了。從那時起，人類所有進化

的，改善的，發展的工具，不是他的器官，有如掌牙等等，而是勞動的，鬥爭的工具。工具是手的產物，而又是人與自然的媒介物。人類是以工具來適應自然的。人類有了工具的幫助，就能形成人造的環境，他就在這環境中生活；此後生存鬥爭的性質，也是由這環境來改變的。原來，人是變自然約制的動物，今則以文化之力，竟成爲自然界的主人翁，因爲他們能以衣服代皮毛，以宮室代山洞了。綜之，從前的『你須要』*You must*，這時候已代之以『我願意』*I wish*了。

辟雷漢諾夫 *Plekhanoff* 說：『人類在勞動工具中，似乎得了新的器官，變換生理的構造了。自人類使用工具時起，人類發展的形式，就完全不同了；最初，人類的歷史，和其他動物一樣，是自然器官變化之歷史；現在，人類的歷史，已是改善人造器官，與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了。』見 *P. 101*

anoff — 『元史觀』

動物的器官，在身上是分不開的。人的工具，可與人分離的，這種分離的特性，便是將來分工的基礎。分工愈發達，技術愈專門化，那人造的器官，愈是增加，社會有此不斷增加的器官，便能獲得生存的工具，繼續其生命，增長其超越自然的權力。這樣，個人就不能具有一切生活的『器官』，再和動物一樣了。人類社會愈能戰勝自然，那脫離社會的個人，愈是孤立無援了。所以，自有人造工具以後，個人對於社會的依助，逐步地密切不可分離了。

這樣看來，技術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器官的系統，人類之所以超越於動物界，即藉此器官之力。工具給人類以新的進化的路線和可能，且使之戰勝死的和生的自然。所以，馬克斯說：『骨。骼。構。造。的。遺。骸，對於研究滅跡的動物。

的組織，有重大的意義；勞動工具的遺型，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組織，有同樣的重大的意義。」（見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第十章）。

可見人類是使用工具的動物這一句話，正所以證明人的特性，在人類歷史的萌芽時，沒有一處不與哺乳動物相類似的，所以，我們也就不能說，人類是一種特出的物類，有特殊的世界的。Pekharoff 很正確地告訴我們說「不要忘記，量的區別是會轉到質的區別的。某一動物所有雛形的器官，在其他動物，能成爲特別重要的器官。這在工具使用方面，更爲顯著。象能折枝驅蚊，這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可是在『象』的進化史中，折枝驅蚊，當然沒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爲象之所以爲象，不在象之祖先是枝驅蚊的緣故。使用工具的人類就不同了。澳洲土人的生活，全賴一種叫作 *Boomerang* 的武器，正像現代英人的生存全賴其機器一樣。如果你奪取了澳的人

武器，使之爲耕種的田夫，那他必然要改變其生活的形態，習慣，思想及其自然了」(同上)

(七) 勞動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

初時，與猿類相近似的人的祖先，和現代的猿類與象一樣，有時直覺地，盲目地甚至於反射地使用周圍的天賦的自然工具。他必須常時地移動，從生活條件不適合的區域跑到適合的地方；否則，新的生活條件，還不能一一適應時，自身已遭毀滅之禍了。逐漸他又傾向於定居的生活，使前肢得解放其攀援的動作。前肢解放了，他便易於使用樹枝，石塊，及其他自然的工具。後來，思考的力量日漸加增，又能製造改善自然的工具使合於實際的使用。例如，想使石爲小塊，便擊碎牠；想使石塊變爲銳利，或易於握持，便截

尖牠。凡爲人類器官所不能勝任的動作，如抓掘，鑿孔，磨擦，等等，都可以人造的工具替代。人類有此工具，在其生存鬥爭中即能應付自然之抵抗力。人越是在積極的勞動的過程中活動，換句話說，人越是能夠使死的和生的自然受其支配，那他越是能夠改變其自身的自然，自身的有機體。他不斷地使用勞動的和鬥爭的工具，那我們野蠻的祖先的不靈活的手，便能成爲現在的形態了。

馬克斯對此十分重要的意見，有以下的說明：「勞動是人與自然間相互活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人在這個過程中，用自己的活動力，來約束，調節，支配人與自然間之物質的交換。要使自然的物質，成爲適合於生活條件的相當的形式，那他必須要把附屬於本身的自然力，指，掌，頭腦等等，不斷地活動。他做了應付和改變外界自然的活動的媒介，同時，他又改變了本身的自

然。……這樣，自然所給與的材料，就成爲人類活動的器官；人以此器官與自身的器官相接合，那就改進了人的器官的自然形態了。」（見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

人在積極的勞働過程的影響之下，不唯改進了他的機制，而又改變他的智力和意識。在人類未得勞働工具的助力，應付自然之先，他的生活經驗，正與動物的生活經驗一樣，是單純的，膚淺的，因爲對他有意義的東西，範圍是很狹小的。這樣，人類的理智就和動物的理智一樣，不能有所改善有所增進了。從他有了勞働工具的時候起，人類經驗，逐漸地擴大，在他的視界中，更有意義的新的物質，逐漸地發現了。人在勞働過程中，積極地反應而又改善這些新的物質，他就常常看到自身活動的新的經驗，注意到工具與生產品的變化，又發現其他各種物質的新的特性和新的方向。有了這種種活動

的過程，人類的理智，就能向前發展了，增進了，磨練了。在使用天賦工具（自然器官）時，代替理智的是本能，本能是自然的習性，在相當的情形之中，有不同的表現，一切動物的活動都是受這本能的約束的。在使用人造工具的時候，就不免，而且必然能夠，得到一種有意識的推理，這是因為他的活動已有成算在先。所以，人自製造并改進工具以後，便有判斷事物的能力了。由此，人對於自然萬物的關係，自然是有意識的關係；他的活動，必然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性質了，人與動物分別的界限，就在這裏。

馬克斯說：「蜘蛛的經營，使我們聯想到紡織工人的活動，蜂以蜜臘建築蜂窠，足使建築家驚嘆不已。但最拙劣的建築家，與最上乘的蜜蜂之間，一開始就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築以前，已有成竹在胸了。勞働終結後所得的效果，在不會開始建築時他的意念中早已具備了。換句話說，

勞働者，事前已有相當的籌劃了。他不僅改變自然所賜的工具的形式，同時，他又有自覺的目標，這目標能確定活動的方法和性質，同時，又須受其意志的支配。此種支配，並非一種單純的動作。人類勞働時，如有意志的支配能力，那工作時間，就能省減而工作效力增大了。『……』（見資本論第一卷）

從馬克斯的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出人與動物的勞働有很大的區別。人類各種合度的動作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種合度的有計劃的動作，是人類具有偉大的推理能力的結果；而此推理的能力，又是使用人造工具，反應死的自然的結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思想的活動，便是進一步的手肢的工作，又是勞働的產物。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製備第一次粗劣的，原始的，不曾加以思索的工具時，原始人類的智能中，已發現了第一次

光明的意識了。只有這樣的活動，才能把人類的猿類變成猿類的人類。

所以，理。智。不。是。人。類。發。展。的。原。始。的。要。素；它。是。勞。働。的。產。物。其發展的趨向，是由人類應付自然的積極的過程向前指示的。恩格斯說：「勞動發展史是認識一切社會歷史的關鍵」（恩格斯——『L. Fourback』）

此外，人類的語言，也不是突然產生的，它是長期複雜的進化過程中的產物，與勞動，工具同時發展的。第一聲有音節的聲響，是勞動過程中由胸部激發而成的呼聲。（或在生存競爭中，激發的聲音）。這種呼聲，是隨勞動形態之變化而變化的。例如：「嘿」是樵夫所發的聲音，「哦」是拽重者所發的聲音，「哈」是跳高者所發的聲音，「呼」是吹火者所發的聲音，這些都是原始人類最初的語言。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勞動開始時，集體的勞動，那勞動的呼聲對於集體的組織，當然有重大的意義。原始時代的技術，是非

常幼稚的，當時的工具，又是非常粗劣的，所以原始人類的勞働，不能不有
一致的結合，這樣，人類就以鐵的團結力，戰勝了動物的羣體，一變而爲人
類的社會了。集體的社會的勞働，需要相互間通達意欲的方法，這方法只有
靠經常的感嘆聲和勞働的呼聲（還有輔助的手勢）而後可能。例如：「哦」
這個聲音，是含有命令的或疑問的語氣的，可作「拉吧」！的意義，又可作
「你拉了沒有？」的意義。從此可知最初語言的構成，只在同類的社會中，
勞働的集團中是可能的。有人以爲：動物無言語的原因，在它不覺得有分音
節的言語的需要；殊不知動物之所以無需於言語，是在他們沒有集體勞働的
緣故，這就是說，他們相互間是無話可說的。若果這是實確的，那末言語的
開端是與勞働同時發展的。試看：動詞的字根，就是語言的基礎。這第一聲
言語，並不是名詞；就是說，不是物類的稱呼，而是動詞，即說明行動的言

語。物類的稱號，是在人類勞動的實際經驗中逐漸確定的（初有語言時工具的稱號是與行動的稱號相吻合的）。

這樣看來，言語是隨着勞動的複雜和發展而進步的；勞動不斷地發展，人類也不斷地增加語言的字音和字形，使之能自由地發表他的思想。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思想是未宣發的語言。人如沒有語言去表示，誰也不知道他所要說的是什麼。俄國著名的生理學家 Sechenov 說：「思想是實際的反映」；Max Miller 研究所得的結論是：「思想是無聲的語言」，這就是說：語言居先，思想是隨着語言發生的。

從上面這些話看來，我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我們所得到的是：勞動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的過程，這是因為「勞動創造人的本身」的緣故（引思格斯的話）。人如沒有人造的工具，和積極的勞動過程，他就成爲單純的

動物，將與自然的奴隸，猿，象，海狸以及其他動物，毫無二致。他的生命，將完全依靠他的自然器官的發展；因之也將無所謂人類歷史的發端了。人類歷史是在勞働工具代替人類自然器官，對於人類生活發生重大作用的時候發端的。在那時候，達爾文的學說終止，而開始馬克斯的學說了：消極的適應環境對於人類有機體的反應終止了，積極的適應（有機體對於環境的反應）開端了。所以，由有機體適應環境所產生的變化的結果，他又把他自己改變了。

Labriola說：「歷史是手的產物，因為手能發明和改善勞働的工具；然後由此工具的助力，創造人造的環境，這環境的影響，就在原來的手上表現出來了。此後人類進化的條件，也是以這環境為主體的，不過人類的環境漸趨複雜化罷了。（見Labriola的『唯物史觀』）」

Bohl 說得更妙：「人與動物間的差別，是在：人能呼之爲思想的動物，但動物，是無思想的動物」。（見Bohl著『婦女與社會主義』，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學說，完成了達爾文的學說，它的出發點，正在人與動物發生根本區別的地方，它告訴了我們人類之所以成爲有『思想的動物』及其所以由自然的奴隸變爲自然的統治者的原因。我們看得出：人造工具的使用，是人類最明顯的特點；此後人類社會的一切歷史，都是以文化或人造環境所創造的工具（人造器官）的發展爲推移的。所以，人是動物的一種，他在人造的環境中，技術和勞動過程的影響下，發展他的智力。換句話說，人類的歷史，是社會動物的進化，勞動發展的產物。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說：人做了勞動與外界自然間的媒介以後，就改變了他自身的自然。這就是說：人是文化的動物，人之所以發達，不在他有無理

智；就反面說，理智是在人造環境的影響——即在勞働過程的影響下——發達的。如果用其他的方式來說明，那就是說：人不是靠自己的理智創造勞働的和鬥爭的工具；反之，此種工具創造了人的理智。再用另一個方式來說吧：思想的禮物，——人類的智力——是手的勞働的產物。

這樣看來，手是人的理智的創造者；勞働是有理智的人類的發動力。在勞働與智力這兩種現象中，勞働佔在先，智力在勞働的後面。政治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換了個字面說：「自然是物質財富的母親，勞働是它的父親」，我們不妨這樣說：如果自然是人類的母親，那末勞働便是他的父親了。總之，我們祖先在他的生存鬥爭中，不自覺地改換他的本身，由動物一變而為有理智的人類了。

因之，一切關於神造理智意識的思想都是自欺欺人，無私毫根據的說話

。殊不知人類自有它的自然的歷史；要知道他的歷史，須先知他對於外界自然之若何的反應。綜言之；「初有思想」這一個舊的公式，我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代之以「初有勞働」這一個新的公式了。

（八）從達爾文主義到馬克斯主義

在達爾文看來，生物進化的原動力，是自然淘汰。所以，動物界的歷史，即是自然技術的歷史，換句話說，動物的生活，必須適應自然環境的條件，動物在這適應的過程中，自有他天賦的，生理的器官之發展的歷史。這整個的過程，不啻是一種被動的痛苦的現象，因為動物改換他的器官，不是由他的意志和他的勢力所致的，而是長期中受自然淘汰的結果。我們算數不清有若干千萬的同類，因為沒有相當的適應的器官而盡遭毀滅了。故動物欲適

應自然環境，必須要將原有的器官，勉強更造過而後可能。

人類社會的進化的原動力為生產力。人類的歷史，是人造技術的發展史，換一種方式說，就是人類在其適應自然的過程中之人造的技術的器官或工具的發展史。我們看這樣的過程，可以說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現象，因為人類創造文化，改變自然環境以後，用他自己所製造的改善的工具來完成適應自然了。

所以，有機物界與人類社會的發動力，同是生活的鬥爭，不過它們的性質和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有機物界的發動力是被動的，是以自然的天賦的器官為主體的，人類社會的發動力是主動的，是以人造的器官和勞働的工具為主體的。這就是說：生產在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中所有的作用，正與有機體的發展中之自然淘汰的作用同一意義。

所以馬克斯有這樣的一段話：「人類史與自然史的區別，在前者是由我們演成的，而後者則否。人類對於自然的主動關係，生產的過程，生活的社會關係，以及精神的觀念，都是由技術產生的結果」。（見馬克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編第十三章）。

這樣，我們不難明白了，雖則達爾文主義的法則，不能機械地應用之於社會的現象和社會勞動的過程，但是它與馬克斯主義之間，自有其合理的結合處：雙方同是尋求有機體適應環境的法則。這意義如果用生理學的名詞來說，就是「主動的適應」，如果用社會學的名詞，就是「生產」。

所以恩格斯的話是很對的：「馬克斯主義包涵了達爾文主義，而達爾文主義是不能包涵馬克斯主義的。要從馬克斯主義回復到達爾文主義，只要把「主動的適應」除外就夠了。反之，要從達爾文主義進到馬克斯主義，就有

容納『主動的適應』的必要了。這樣，主動的適應不會成爲由此一學理轉變到彼一學理的過渡的橋樑了』。

我們還聽到有人這樣的說，積極的適應，不僅是人類專有的特性，其他動物也未嘗沒有。但是我們不能拿『活動』(Activity)與『積極的適應』(Active Adaptation)這兩個意義混解了。凡是有活動能力的一切動物，皆是『活動』的。任何動物，只要他有任何的行動如覓食，攫取，攻擊，自衛等，都是『活動』的動物。普通動物的動作，或是有機體的器官的運用，是與環境的變化相吻合的。例如：動物有所採覓的時候，他必然踏殘或摧折就地的植物，但同時，又遺留了排除的肥料足以培養就地的植物。可是，這種活動的結果，是絕對不能與積極的適應性相提並論的。積極的適應，是活動的特殊形式，多少是對於外界自然之有計劃的合度的反應。生產的意

義，猶是經濟活動的過程，它完全包涵積極適應的意義，正如我們上面所述。除人類外，其他的動物，並不是絕對沒有積極的適應性的；不過，我們已經說過了，人類積極的適應，與動物積極的適應，有質與量的根本區別。人類的積極適應，是有意識的勞働過程，而動物的是本能的作用。例如，蟻穴與蜂巢的建築純粹是本能的動作。我們站在動物界的階梯上，就會看見原始人類，或類人猿之有意識的積極的雛形動作，有如高等猿類，在夜間是用葉披在身上以資保護的。進一步，我們更可以看得出，人類積極的適應，引起我們的注意的地方，在他反應外界的自然時，是借助於人造工具的力量，而不是天賦工具的力量。原來，有使用天然工具能力的動物，不僅人類爲然，即使人類的祖先——猿類也是有同樣的能力的；但是，他們無能力生產一種絕簡單的工具，要有意識地擊碎石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動物的

積極適應，其意義為被動的，限制的，僅僅是形式的表現，我們決不能對此意義有所混解。混解這意義，就等於抹殺積極適應和消極適應的區別，混淆人在有機物中的特殊的作用，錯認社會進化過程的性質。

人類適應生活條件，支配自然環境的要素，是在人類有製造工具和分工合作的能力（分工合作是改良勞動工具的條件），以及借自然之力運用工具的特技。須知工具是人類生存的條件，人是靠勞動工具和生存方法的力量而生產的，但同時他又創造本身生存的條件。人既創造自身生存的條件，而又使這條件有整個結合的重大的意義，那人類對於生活條件所依賴的環境和自然的統治地位愈加增高了。所以，社會生產就是人類適應積極環境的過程，它使人類有支配生活條件的能力，和動物分別出來。綜而言之，人類自有文化以來，是積極適應的產物，或稱作社會生產的產物，亦無不可。

(九) 勞動是有機體進化的要素

根據上面所述的意見，我們就知道，達爾文主義對於人種的由來，是同動物的由來一樣看待的；唯物史觀所解說的，是人類之歷史的命運。馬克斯主義者開始研究的着手點，就是達爾文主義者研究的終結點。達爾文以動物學爲末點，而馬克斯是以社會學爲始點的。

同時我們從上面所說的話中又不難看出，馬克斯主義有幾部份也有涉及達爾文主義的地方，但它又使生物學者注意到他們所未曾注意過的，或注意過而未曾得到真確的估計的有機物進化的要素——勞動。

恩格斯的著作，在人類進化的事例中，說明勞動的作用，認定勞動是人類進化之原動力。

生物學的中心問題，是在研究物種變異的原因，達爾文並不否認除自然淘汰外，尚有他種原素的作用，但他之側重於自然淘汰的意義，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所以結果，達爾文主義者（切實點說；「極端的」達爾文主義者或新達爾文主義者）常以為自然淘汰是物種變異的唯一的要素。恩格斯對此問題曾經這樣地說過：當達爾文注意闡說自然選擇的重要的時候，他就丟開了那引起個體變異的原因，過於側重物種的變異。這一種的缺點，此後科學家也同達爾文一樣，不免重蹈覆轍，——但事實是事實，研究有機體的變異問題，當以達爾文為首創者，因為有了他的發現，社會對此問題的究竟，有研究的興味的。

恩格斯說明這意見的時候，大抵是在達爾文學說出而問世以後的二十年。我們已說過，這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思想家對於一般自然科學的問題，尤其

是生物學說的問題，頗有深刻的研究；同時，他又是達爾文之熱心的忠實的擁護者，可是他對於達爾文的整個的思想，並不當作教義一樣看待的。他說：「進化論雖則得了事實的助力，但進化論的本身，仍然是很幼稚的。因此，將來的探考，必然會改換目前的研究的結論，內中達爾文主義者對於物種進化過程的概念也該有相當的更改。」（見恩格斯——『Anti-Diiring』）

恩格斯怎樣研究我們祖先的變異的問題呢？他又怎樣推測各個物種——人類的由來呢？

他很明顯地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手，語言的器官，以及其他的器官，是在必需勞動的過程中逐步進化的，改善的。照恩格斯的意見，在各種勞動過程中，人類器官的習練，對於人類有機體的變化，具有莫大的作用。只有勞動和習練的助力，才能使我們的器官適應新的動作，並以新的特性傳之於後

。所以在恩格斯看來，生物有機體的變異的原因就是勞働。當然，勞働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這是沒有什麼疑義的。

這樣看來，恩格斯很注意於人類有機體的發展，改善，是習練的結果，因之，外界環境也就容易滿足他的要求，適應他的自然了。同時他又提到其他生物的有機體和單獨的器官。器官的進化及其向前的發達是因為習練的結果；易言之，是消除外界自然的阻力有機體不斷習練的結果。反過來說，器官因無活動的條件失了作用停止習練以後，它就退化，萎縮了。所以器官的形式與功用之間有了必要的關係，那器官形式的變異的原因不仍是勞働（習練）和外界條件的影響嗎？誰不了解這點誰就錯解了物種變異和人種由來的問題了。

我們注意到，不僅在恩格斯以前，即使在達爾文以前（1809），法國著

名的生物學者Lamarck氏會說及器官用與不用的影響，以及環境對於有機體變化的作用。當然Lamarck是物種變化論的首創者，但他沒有充分的材料來完成他的科學的學理。達爾文是研究Lamarck思想的人，他從不會蔑視Lamarck的思想。達爾文說：「用與不用的遺傳作用與自然淘汰有同一的意義」。但無論如何，他沒有充分應用Lamarck的思想來解釋有機體的變異性呢！

從此可知恩格斯是以新的形式來應用Lamarck之舊的思想，補充達爾文的進化論的。他對我們說，勞働，與自然淘汰等，是有機體進化過程的要素。這種進化的過程，大抵是如下的情形：有機體在勞働、習練和環境的影響之下產生了新的特性；新的特性，因了自然淘汰的幫助，而愈加堅強了。我們可以反覆地說，或許這樣的進化過程，還有比較複雜的地方，但是這兩種要素——勞働與自然選擇，——是互相補助而不是互相衝突的。

(十) 結論

Plekhanoff 說，馬克斯主義是應用之於社會學的達爾文主義。但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說：達爾文主義是補充生物學的馬克斯主義。須知馬克斯主義與達爾文主義就其實質來說，是在研究同一現象——技術所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形式的。自然，達爾文主義在自然技術的發展中，獲得了若干認識有機體進化的祕訣；而馬克斯主義在人為技術的發展史中，獲得了若干認識人類社會進化的祕訣。所以，每一個學者和一般思想家，他在研究有機物界的境域中自認爲達爾文主義者，願永爲達爾文的真正的繼承者，那他在研究人類社會的境域中不能不成爲馬克斯主義者了。換過來說，不是達爾文主義者，決不能成爲馬克斯的繼承者。但這並不是說，人類史僅是普通生物學的特殊的場

合，因為達爾文主義的法則，是一回事，馬克斯主義的法則，又是一回事。並且，馬克斯主義又較達爾文主義為廣大，前者補充了後者，以新的重要的意見，作為後者的闡發。綜之，這兩種學理，是科學的唯物的學理的一部份，它們相互間，有合度的關係，也有分割的界限；因為同出一源的學理，自有他們相互為用的意義的。

第二卷

勞働是猿到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產物

恩克斯遺著

勞動是猿到人類的進化過程中的產物

政治經濟學者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誠然，勞動是財富的泉源，勞動得了自然所給與的材料，而後變之爲財富。然而勞動的意義，實有大於此者。它是一切人類生活之唯一的根本的條件，在另一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斷然說，勞動是人類的創造者。

數千萬年以前，在地質學者稱作第三紀的末期，有一羣比較進化的類人猿，在熱帶，或在今日之印度洋的地面居住着。達爾文對這一類的我們的祖先，曾有一個簡略的近似的紀述：他們自首至尾叢生着毛，有鬚，有銳利的耳官，結羣住在樹上。

他們受生活條件的影響，他們的手，在前行時，抓握時，攀援時，其功

用途與足不同，在地上移動時逐漸可無需於手的支助；因之，逐漸養成了直行的習慣。人類祖先之所以進化爲人類，這確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現在的類人猿，能直立，又能以兩足前行；但他們直立的移動，非常的困難，彷彿失去了助力似的。他們天然的步行，大抵需要雙手添加支扶的助力。先用拳支在地面，再舉足向前伸展到手旁後，才始移動，恰像跛者的杖行般。就一般看來，現在猿類中尚有二肢行動與四肢行動間之過渡的情狀。但是靠二肢行動的猿類，仍然是極少數。

我們披毛的祖先，如果直行是先由習慣而後成爲必要的話；那末手的一方面，必然又有其他的動作由它執行了。猿類曾有手與足的分工，前面說過，用手攀援時，手的功用與足的就迥然不同。他們又以手取食物正和哺乳動物以前肢攫物一樣。有的猿類，如黑猩猩，靠着手力建築樹窠，用樹枝編成屋頂

，以防不測。又有的用手執棒抵禦敵人；有的以樹枝碎石擲人；不幸爲人所獲，亦能以手勢學人之行動。但是這裏，十分像人的猿類，較之數千萬年經過勞働過程的人類，雙方的手肢，相去仍不可以道里計。手的骨格筋骨的構造及真數目雙方是一樣的；可是最低等的野蠻人的手，能有無數的簡單的動作，而猿類則無一能之者。從來沒有過用手製造工具的猿類，即使很粗暴的石刀，他們是不會有製造的能力的。

我們的祖先、在數千萬年由猿類進化爲人類的過程中，漸使手的動作，適應於生活條件的需要；當然，這動作在開始時是很簡單的。低的等野蠻人，雖尚在動物的狀態，其軀幹雖亦有退化的現象，但是同過渡時代的猿類比較起來，還是高出千倍。須知人類的手，能創製一柄很簡單的石刀，那它已經過一個很悠久的歷史了。手能解脫其他的工作，是人類一個很重大的造詣，

因為從此以後，手能進行新的敏捷奇巧的動作，且得傳遞於後代。

這樣看來，手不僅是勞働的器官，并是勞働的產物。有了勞働，手就能適應於一切新的工作，由遺傳的作用，形成一種特殊的構造；然後更有新的功用，繼續產生。人類的手，只能循此進化之過程，始能達到完成的地步，有如 Raphael 之繪畫，Torvaldsen 之雕塑，以及 Paganini 之音樂，一一都是手的產物。

但手不是一種單獨存在的器官。它是整個的複雜的有機體的一部份，凡有利於手部的，亦能影響及於全部的有機體，此種影響的方向，有二：

第一是達爾文所稱的「互長律」的作用。根據互長律的見解，有機生物之一部份的器官的形式，與其他各部份的器官的形式，具有經常的聯繫，雖則表面上，是毫無關係似的。有紅血球而無血核的動物，其頸骨兩關節與脊骨

相聯結；——像這一類的動物，是具有鐵質的乳料作為子的營養品的。哺乳動物的偶蹄類，通常是與複雜的反芻的胃囊相連系的。所以某一部份的器官的形式有了變化，就會引起其他部份的器官的形式的變化，這兩種變化的關鍵，我們還不能十分知道得清楚。純白毛而碧眼的貓，往往是雙的。人類手的進化，足的直行的習性，自然會使其他各部份的有機體，受互長律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的研究，此時尚無多大的造詣，所以，我們不能進一步的觀察。

比較重要的還是手部對於其他各部份的有機體的影響。我們說過了，我們與猴類相近似的祖先，是依着社會生活的；我們對於動物中最富於社會性的人類的祖先，還能說他不是社會的動物麼？自手部發達以後，人類對於自然的統治，日有進步，而人類之意識的境界，自較前為擴大了。他在自然的

萬物中，不斷地發現前所未聞的新的物質。另一方面，勞働的發展，在必要時，能使社會的組成員，緊緊地結合，因為這樣，人類互助之機會得以日密，而共同協作之利益，人人都能親切地感覺到。總之，由動物形成的人類，漸覺得有互通達語言的必要了。

有了需要，然後有相當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逐漸地進步了，能由一種音節，轉而為他種比較複雜的音節；口部的器官，亦漸習於有音節的發音了。

這樣的解釋言語的由來，是真確的方法。比較進化的動物，他們之相互的達意，是不必有語言的幫助的。自然狀態中，沒有一個動物覺得有不能言語或是不懂得人類說話的痛苦。若是被人類馴養的動物，那情形就不同了，犬與馬，對於人的言語，聽覺至為靈敏，在動物所有的想像的範圍內，對

於一切言語，經過習練以後，都能懂得的。有時，他們甚有對人表示敬意和謝意的感覺力，這種牠們向來所沒有的能力，也可以由習練得來。這在愛好此種動物常同居的人，大抵誰都有這同樣的感覺。有的時候這類動物因音帶器官的特殊構造，逐漸感覺到不能言語的缺憾了。在音帶器官比較適合動物，那就能免除這般的缺點。鳥的喉管的構造。當然比人類的相差得很遠；但是牠們比較得容易學習語言，鸚鵡的喉音，是最惹人厭聞的，可是鳥類中說話最好的，常以鸚鵡為第一。你們不要以為牠不會了解牠所說的是什麼。當然，牠能不斷地反覆重說同樣的言語，但牠亦能了解想像所及的說話。若以謾罵的言語，教之鸚鵡，而鸚鵡亦能以同樣的言語相報答，彷彿同柏林的小商人一樣的饒舌。有時，示以美觀的物品，鸚鵡能表示其欣賞的意思。

勞働與言語，是猴腦變成人腦之最重要的主動力。人的腦部發達了，而

後有感官的發展。同樣，言語進步了，那聽官亦隨之而敏捷了。鷹的眼睛比人的強銳得多，然而人的眼睛的識別力，遠強於鷹；犬的鼻子，比人的銳敏得多，然而人的鼻子能辨別各種不同的臭味，這樣，便判然有人禽的分別了。

猿類的感覺，亦隨勞働過程中手部之發達而發達的。腦部的發達，受腦部支配的種種感覺，日在進步的意識，以及抽象思索和判斷的能力，亦能促進勞働與言語之向前的進展。此種進展的過程，不因猿到人類的轉變時期之完成而中斷。各時代的民族也有同樣的情形；發展過程的異同，是以民族的程度及其發展的趨向為標準的，有時，反有一時的退化和破裂的現象，但是整個地看來，他們是有前進而無後退的。自有人類發現以後，在發展的過程中，又有新的要素——社會，相依而生，社會在一。方。面。有。力。地。推。動。勞。働。與。言。

語的發展；在另一方面，能使勞動與言語的發展，有一定的方向。

在地球史中的幾千萬年，何異於人類生活史中的一瞬；但是在猴羣尚未轉變為人類社會以前，已經過了這樣的一個長的時期。而後始有人類的社會發現了。

究竟猴羣與人類社會的區別，又在那裏呢？——我們的答案是：在於「勞動」。

猴羣只靠着就地的食料，維持其生活，有時因地理的關係或附近獸羣的競爭，盡量取食，直到窮盡，然後，才移植於新的區域，繼續他們的營生。但他們除自然所供給的數量外，再想多得食物的生產，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固然，他們也能無意識地拋棄自己的排泄物，增長食料生產的能力，但我們就猿類與生產的關係看來，這是無計及的必要的。如果所有的區域，都被佔據

了，那猿類的蕃殖反轉會有中斷的危險；能夠維持原有的數量，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我們在動物中，可以看得出，當他們攫取食料的時候，多半是浪費的，他們常常摧毀萌芽時代的食物而毫不知道愛惜。很和獵者一樣，對於臨產的牡羊，是毫不加以憐惜的；希臘的牝羊生長在幼嫩的灌木叢林中，竟把許多地帶，化作不毛之地了。此種掠奪的經濟，在動物進化的過程中，頗有重大的作用，因為有了掠奪的經濟，動物才能傾向於新的食料；新的食料，能使血的化學成份，發生變化，有機體的構造也就逐漸地變化了。同時，物種之不易適應環境的，也被自然淘汰了。

掠奪經濟對於我們的祖先變人類的過程，有很大的反應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自猿羣能適應於其他各種食物以後，那食物的數量，和區域，隨之增加，食物的性質，也有了變化；那末溶化於有機體裏的物質，也有了變

化了——這是人類形成之化學的條件。

但是這些過程中，還說不上勞動，如果就字的本義來講的話。自製造具的時候起，才有勞動的發端。我們從掘得的人類在歷史以前的遺物，以及古代民族與近代落後民族的形態看來，那這些原始的工具，究竟是怎麼一類的東西呢？這些都是打獵的和捕魚的工具；而且，當時的工具，與武器有同樣的作用的。有了打獵和捕魚所獲的食料，就由菜食轉到肉食了。這又是形成人類之重要的步驟：肉的食料，包涵有機體所必需的元素；這已經是成熟的元素是在有機體中，又可以減消化的困難，增加了營養的效果了。由是人類的食物去植物界愈遠，則人類之超越動物界的程度愈高。同樣，野貓與野犬，除肉食外如果能使牠們習於植物的食料，那牠們便能成爲人類的服役者；人類方面，除菜食外，能習於肉食，一切的進展就可以加速了。

但是受肉食的影響最大的，還是人類的腦部，腦都得了肉食的營養，發達極速。菜食論者向我責難說——「人類發現時並非沒有肉食的反應的，可是我們所知道的民族，有因肉食而至有人食的現象（柏林人的祖先有在十世紀剝食父母的），那現在，肉食對於我們當然無多大的意義了。」

須知肉食會產生兩種重大的結果：一為火的使用，一為動物的馴育。有了火，就減縮了食物消化的過程，因為食物經過火的作用以後，就成為半消化的物質了；有了馴育的動物，就會有經常的食物的泉源，同時，動物的乳料，亦不下於肉的補益。這樣看來，火與馴育的動物，不啻為人類打開了一條解放與進步的大道。如果我們再把它們分別來說，那未免去題太遠了。綜之，它們對於人類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具有莫大的作用的。

人類不僅是習於各種的食料，又能習於任何種的氣候中。在地面上蕃殖

的，只有他是最能適應於自然的動物。其他動物有的體習居於各種不同的氣候中，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意志的，有如家庭的動物，是與人類共居而後可能的。人類由熱帶轉移至寒帶以後，生活上又有新的需求隨之產生，他們必須有禦寒的衣服，有避冷的居室，然後才得安居無慮。這樣必不免有新的勞働和新的工作形式；人與動物之相去，由是更遠了。

在全個的社會中，手部及言語的器官，與腦部，發生了相互的作用以後，人類即能執行比較複雜的工作，向着更高尙的目的前進無已。勞働過程的本身，是多方面的。有了狩獵和畜牧，就有農業的經濟，有了農業，就陸續有紡織，冶金，採煤，造船等等的事業產生。與工商業同時發展的有藝術與科學；有部落以後又有民族與國家之組織。有法權以後，復有宗教之興起，所有這許多的情形，似乎完全是腦部活動的產物，在人類社會上，佔極重要

的地位，此時手的地位，似已佔在次等。由原始社會的簡單勞働，人類的理智，漸能規定工作的設計，促使他人的手力，執行他自己所預定的工作了。

這樣看來，手與腦部的發達及其活動，就是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之最初的力量了。因之，歷來人都以為一切的行動都是思想的產物。唯心的宇宙觀就由此產生。自羅馬帝國覆滅以復，唯心思想，更瀰漫一時。即使現在，唯心思想的勢力，還是不少，自然科學家如達爾文者，亦不能明白地說明人種之由來，這是因為他們在唯心論的影響之下，不易了解勞働在人種由來的過程中的作用呀！

我們反覆地說過，動物同樣能以自己的活動改變外界的自然，雖則不能和人類有一樣的成效；由他們所產生的變化，也能反應到他們的本身的。這

因爲自然中是沒有特殊的偏袒的，彼此現象，都有相互間的反應，無有已時的。

自然科學家如果不知道注意自然界多方面的活動及相互的反應，那他就
不易了解最單純的現象，我們知道，山羊不能使希臘變爲森林的國家；St.
Helena 河岸自有牝羊以後（係水手遺下的），從前所有的草木，都被食盡了。
。但是此後的移民，又能以新的植物在野地上培植了。

如果動物能不斷地影響周圍的環境那並不是動物自身的意志而僅是偶然
的情形。人去動物界的距離愈遠，那人類反應自然的活動愈有計劃，愈加思
索而愈有一定的目標了。動物摧拆草木時，不曾顧慮到怎樣生產新的產物；
而人類之芟刈草木爲的是播新的種子（五穀，葡萄等等）準備取得新的豐裕
的收穫。人將有用的植物與家畜，各地互相交換，使全世界的動植物，都有
互相移殖的機會。再進一步說，動植物經過手的人工撰擇以後，其原形之變

化，有的簡直令人不容易辯明他們的來源。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曾明白我們各色各樣的犬和貓，是從那些種的野獸演化而來的呢！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以為動物的行動是絕對沒有計劃，不曾加以絲毫的考慮的。事實上凡是有原形質的地方，就有有秩序的活動，因為原形質能調節對外界自然的反應動作，這就是說，原形質受了外界的影響，就必然有相當的顫動。此種顫動，固屬極其單純，然原形質亦有其調節的規度。所以，有細胞存在的地方，就有此種調節的活動，那更不必說神經系的細胞了。

蟲食植物採取食物的方法在相當的程度，也是一種有秩序的活動，雖則它是沒有意識的。動物隨神經系之發達而後有意識有秩序的活動，至於哺乳動物的活動，那更較一般動物為發展了。例如英人之好獵的狐，他的狡猾靈敏常使獵者束手無策。受人馴育之家庭動物，一舉一動之敏捷，也常有小

孩模樣的智慧。人類胚胎時期的進化的歷程，是重覆了我們動物的祖先之生理進化的歷史；同樣的，童孩的精神演進史，亦是動物祖先之智育的演進史之重演。但所有動物之有秩序的活動，終於不能有他們確定的意志。

綜之，動物只能利用外界的自然，只由他的自身，引起自然的變化；而人類則以改換自然的力量，使自然受人類的支配，籍以達到人類的目的。所以，人與動物的區別，其主要的力量，仍然是勞働。

現在暫不申述人類之若何戰勝自然，且看看在這戰爭中人類力量的弱小。須知我們每一次所得的勝利，自然都有相當的報復給我們的。初時的勝利，當然能得到我們預料的結果；但是以後我們又會得到意料以外的影響，把昔日所得的勝利全盤被自然毀滅了的。在米索不達米亞，希獵，小亞細亞及其他各地的居民，因想利於耕種的事業，就把森林斲盡了；但他們却不曾夢

想到他們的國家反因此而許多地方都不適宜於耕種；因為森林消滅以後，水分就不容易儲聚了。移殖在啞刺伯山的意大利人，把南部山腰間所有的樅林鏟除了，可是他們又不會意想到當地的畜牧事業，將因此而動搖了，同時，他們更沒有顧慮到一年中山上雨水的泉源，因為降雨時，水皆傾注於平地而不能在山域中有所積貯了。這樣，我們在每一步的行動中，不能不想及，我們不能和戰勝的民族對付戰敗的民族，或者是站立自然以外的人一樣；我們人類無論如何，是不能完全征服自然的，我們的骨肉膚髮，都是自然的屬有物，我們是在自然中生活的，我們所謂對於自然的統治，僅僅是在我們比較其他的生物，多能夠理解自然的法則，正確地運用而已。

我們的歷史加多一天，我們就更多一天了解自然的法則，且能預想我們與宇宙萬物相接觸的遠近的因果。從十九世紀機械工業隨着自然科學發達以

後，我們在生產方面，所預見到的將來必然產生的自然的影響，範圍也更加擴大，我們就這樣地成爲多種現象的前因後果的支配者了。我們愈是向這一方面進行，那我們就不僅感覺到，且又明白了解自身與自然一致，到了那時候，我們再不會發生從前基督教時代之心靈與物質，人與自然，精神與肉體間之相衝突的觀念了。

如果我們想預見生產工作之比較遠大的自然的結果，已經費了幾千萬年的勞働的力量；那我們要估量到此種生產工作之比較遠大的社會性的結果，自然更加寸分的艱難了。我們知道馬鈴薯散植的結果，每每會引起一種疾病。但在十九世紀中歐洲各國因了歲收不豐引起一般居民生活之恐慌與乎一八四七年愛爾蘭的大飢年，於是努力種植。後來僅以馬鈴薯爲食物之愛爾蘭人，因受食物恐慌之犧牲，飢餓至死者達百萬人。移居於海外者達二百萬人。當亞

刺伯人發明酒精的時候，他們夢也不會做到未發現以前的美洲的土人將因酒精所製成的工具而遭受不測的禍患的。當哥崙布發現美洲時，他不會知道美洲發現以後，他曾把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與黑奴販賣業在美洲復興了。十七八世紀發明汽機的人，並不覺得他的發明是使全世界的社會關係傾向於社會革命化之唯一的工具。在歐洲，因少數人財產集中，大多數人貧困的緣故，機械工業開始時，歐洲資產階級乃得處在社會的政治的統治地位，而後就引起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卒至資產階級消滅，而社會的階級衝突將一舉而求遠消滅了。這樣，我們在這場合中，逐漸了解我們生產活動之間接的遠大的效果，這必須在長期的爭鬥中，在歷史的事實中，才能預知將來之必然產生的社會的影響；我們也就這樣地調節，支配我們的活動呢！

要調節我們的活動，不僅對此活動有相當的認識就夠了，我們尙須把現

代的生產方法及社會制度有整個的轉變才對。

現有的生產方法，僅求勞働之目前的效果；將來的活動及其效果，是不曾加以顧慮的。原始時代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是與當時人類的進化程度相適合，另一方面，又與當時剩餘農產品的現實相適合的。然而原始社會經濟之破壞，他就由此剩餘品之消滅所致。故自剩餘品消滅以後，土地公共使用制也就消滅了。此後比較進步的生產形式，其結果，分社會為各種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利益時相衝突，統治階級的利益，不需要為被壓迫者的生活而生產，他們只在促進勞働的効力，多得生產品的利潤。西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各個支配生產和交換的資本家，他們僅為目前的利益，而經營。當時的注意力，只在生產的交換的物品之若何有利，而勞働之是否有有利的効力，也就置諸度外了。賣買中所得的利潤，便是

資本家慘澹經營之唯一的動機呢！

（以下是上文的結論）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經營生產與交換之直接的與社會性的效果。各個資本家之經營生產與交換的事業，其目的僅在獲得目前的利潤，所以，他們亦只能注意於最近的和直接的效力。工廠主人或商人能將他們所生產的或批發的商品售之於市場，並獲得普通的利潤，那他們就沒興味注意到商品與購買者的將來了。人類之反應自然的活動亦有同樣的情形：移殖於 *Cuba* 的西班牙人，焚燒山間所有的林木，取其燃具，作為咖啡樹之肥料，但他們何曾注意到熱帶的疾雨，足使肥沃的黑土壤，被急水沖失而化為荒原呢？人類對於社會的關係，和對於自然的關係一樣，在現社會的生產方法中，大家所注意的，大部份是在最初的和直接

的效果；後來又覺得非常地奇怪，在生產活動上比較遠大的影響，正與他們期望的相反，例如供求間的關係，往往變成一個完全相反的場合，十年恐慌的循環律，與德國的所遭受的經濟恐慌，都是彰明顯著的例子。這也是一件無庸置疑的事實，基於工人勞動的私有財產制，必使勞動者的私產完全喪失，財富也就一天似一天地集中於非勞動羣衆的手中了。

（下文原稿散失，故缺）

人類進化的過程

人類是在分化的路線上發現的，這不僅在個體的意義上是如此，即在歷史的意義上，也是如此的。所謂個體的意義，即是說，單純的細胞之若何在分化的路線上進化爲形體複雜的有機體。手部經過數千萬年的嘗試以後，才和

足部分工起來，養成了直行的習慣，這樣，人與猿類的區別，始有形跡可尋，言語與腦部，得有發達的基礎；至是，人猿之相去，一天一天地隔遠了。手有專門的機能，工具始有發明的可能，工具即是人類反應自然與生產的基礎。動物的工具，是狹義的，有如四肢然，這一點，我們在蟻，蜂，海狸等動物中，比較有明顯的例子；動物是可以盲目地生產的；但他們對自然環境之生產性的反應，則等於零。只有人類能對付自然的反應；他不唯轉移動植物界的蕃殖，而又能改變居地的自然條件，與動植物的構造，故其活動的成效，將歷萬世而不沒。

人之所以有此成效，全賴手部之力。汽機雖然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但它的基本力，也就靠手的創造而形成的。與手部同時發達的，又有腦的作用。所謂「意識」的，原來是各種實際活動的反映往後，處境順適的民族就有認

識人類在自然界中活動的法則的能力了。人類對於自然法則的認識愈深，那對於自然反應的方法亦愈多，發明汽機，僅靠一手之力是不夠的，同時又需要腦部的發展，始能收雙管齊下之效。

人類與歷史是分不開的。動物的歷史，是他們之如何產生及進化至現狀的歷史；但是他們的歷史，是由他們自身被動地參加，而不容有他們的意志左右的。人類的歷史，是有意識的創造，所以有一定的預定的目標，放在歷史前程的。但是我們把人類的歷史，即使現代民族的歷史，仔細研究起來，我們仍然看得出，他們所預定的目標，與其所得的效果，又不免有參差的情形。同時，不受人類支配的力量，又較大於人類有計劃的活動的力量。不過，人類的活動和生產之仍在盲目的摸索中進行，那此種畸形發展的現象，當然是免不了的。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自然固已爲人類部份地制服了，生產加增

了，但是生產發達的結果，又是怎樣呢？結果便是剩餘勞動之增長，民衆生活之貧困，每十年經濟恐慌之循環的發生。所以，達爾文謂自由競爭，生存爭鬥是生物界之經常的狀態；他却不曾知道有種經濟學家所謂歷史的成績，是不能應用之於人類的社會的，只有社會生產之有意識的組織，才能使人類超越動物的境界，因為在有意識的組織中，一切生產與交換都成爲有計劃的活動了。社會關係發達，就不難有意識的組織，此時，新的歷史時代開幕了，人類的活動，與自然科學所得到的勝利，在先還認爲是一種隱隱約約的影子，將來就愈進愈有把握了。

603344

105-6